

余华小说中的‘回应’机制演变

— 以《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兄弟》为中心 —

金春梅* · 金美廷**

〈目次〉

- | | |
|------------------------------|------------------------------|
| I. 绪论 | IV. 回应的跃迁：伦理残响与
《兄弟》的荒诞救赎 |
| II. 回应的缺席：沉默结构与《在细雨中呼喊》的断裂叙事 | V. 结论 |
| III. 回应的觉醒：苦难承受与《活着》的内在坚持 | |

I. 绪论

在三十余年的创作历程中，余华始终以锐利而冷峻的叙述姿态观照中国社会的变迁。他的小说不仅记录了时代巨变带来的个人创伤，也展现了个体在碎片化现实中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重新建构。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语境下，余华的写作无疑具有某种‘断裂’与‘连接’并存的特征。他从先锋主义出发，逐步回归现实叙事，而其中的内在转向并非仅是题材或风格的变化，更体现在小说内部人物之间的互动结构与情感逻辑的深刻变动。

本文提出‘回应’这一分析视角，旨在透过文本中人物面对外部情境、伦理困境乃至身份裂变时的反应方式，探讨其叙事中的内在伦理机制。所谓‘回应’，指的是小说人物在特定社会语境中所展现出的语言、行为与心理反应模

* 庆北大学 中语中文专业 博士：第一作者

** 庆北大学 中语中文专业 教授：通信作者

式。这些回应既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节点，也构成理解人物伦理状态与价值冲突的重要通道。通过梳理余华小说中‘回应’的演变路径，尝试揭示其作品在时代语境变迁中的叙事策略与情感伦理的双重重构。

尽管‘回应’尚未在既有文学理论中确立明确术语地位，其所指向的结构与意义却已与多种学术传统建立了跨领域的理论联结与互动张力。回应的理论根基之一可追溯至语言哲学领域，尤其是巴赫金(Mikhail Bakhtin)所提出的对话理论。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表示：“存在就意味着进行对话的交往。对话结束之时也就是一切终结之日。因此，实际上对话不可能、也不应该结束。”¹⁾这一观点强调了‘存在’本身即以回应为前提，揭示了人类生存经验的根本交互性。巴赫金认为语言本身具有回应性，任何文本都不可能是孤立的独白，而是在持续的社会语境与历史张力中与‘他者’展开对话。他进一步强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对话的基本公式是很简单的：表现为‘我’与‘他人’对立的人与人的对立。”²⁾在这一意义上，小说人物的言说本质上就是一种对存在、对历史、对伦理诉求的回应。因此，‘回应’作为本文提出的核心概念，虽不限于言语层面，却在其人物关系与叙事演进中，延续了巴赫金多声部与互动张力的基本理论前提。

回应的伦理指向，与文学伦理学中关于“他者伦理”(ethics of the other)的理论路径形成了深层呼应。莱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强调，伦理的根基不是规则，而是回应他者面容的责任。这一理论使回应超越了技术层面的互动行为，成为衡量主体伦理高度的核心标准。正如孙向晨所指出的，“莱维纳斯的核心思想即在于‘面对他者’，伦理先于存在论，伦理学才是第一哲学。这里‘面对他者’不仅仅是在直观意义上所理解的与他者‘面对面’的相遇，更是指一种精神上的‘面对他者’。”³⁾正是在这种将回应视为伦理责任而非工具性交换

1)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第5卷,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335页。

2)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第5卷,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335页。

的背景下，余华小说中的人物互动也呈现出独特的回应机制变异。因此在余华小说中，无论是《在细雨中呼喊》中沉默中断的伦理冷场，还是《兄弟》中被异化的社会表演式回应，都揭示了个体回应机制背后伦理姿态的复杂嬗变。

在此基础上，为了将前述理论洞见落实为可操作的分析工具，本文对‘回应’的内涵与分析路径作进一步界定。这里所称‘回应’，并非泛指的反应或互动，而是在特定叙事语境中，人物面对具有明确来源的召唤或压力时，所作出的能够辨识其伦理取向的表达。为了避免概念的泛化，本文将‘回应’的对象来源界定为四种类型：其一，是来自具体他者的呼唤、对峙或陪伴；其二，是制度与权力施加的规范与压力，例如政策、组织性暴力等；其三，是历史与时代事件所带来的集体经验与社会变迁；其四，则是源于自我内部的伦理要求与记忆召唤。

在明确回应的对象来源之后，还需关注它在叙事中的具体呈现方式。回应既可能表现为可指认的言语行为，也可能体现为外显的行动，或内在的心理活动。由此，本文将其特征层面划分为三类：语言层面、行动层面与心理层面。这三者彼此交织，却又各具侧重，例如呼喊与沉默属于语言层面，施救与离场属于行动层面，而羞耻、怜悯等情绪则更多体现于心理层面。

在不同的表现层面上，回应还会呈现出随叙事情境与伦理取向变化的多种状态。本文将其概括为缺席、觉醒与跃迁三种，其中‘异化’被视为‘跃迁’在特定语境下的一种特殊表现。为了确保理论与文本分析之间的有机耦合，本

3) 孙向晨，《面对他者：莱维纳斯哲学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11页。莱维纳斯所谓的伦理(ethical)，与通常意义的伦理学(ethics)，有很大的区别。他并不关心建立一套道德行为的规范和标准，也不是要检验道德语言的本质，更不是关心如何过一种幸福的生活。伦理决然不是某种特殊的哲学视野，伦理是第一哲学的视野，是超自然、超历史、超世界的视野。人类原初的生活就是伦理的，伦理是所有真理、自由和平等的根本保障。对于莱维纳斯式的这种伦理，他只提供一种信念，那就是倾听‘他者’的声音，肩负对‘他者’的责任，展示‘为他者’的主体。在莱维纳斯的哲学中并没有一条通向知对错，明善恶的道路，也没有通过道德规则、绝对律令、人生指引来约束人，只是确立了生存中‘为他’。‘面对他者’意味着对我与世界的占有性关系提出疑问，意味着裂解自我的‘同一性’，意味着我必须对‘他者’作出回应，从而肩负起‘责任’，由此‘他者’奠定了我作为主体的伦理本质。

文在细读过程中采用“场景—对象—层面—指向”的四步标注法：首先锁定关键叙事场景与触发源，其次判定回应的主导表现层面，再归纳其伦理指向与后果，最后通过跨文本的同类标签进行对照与分析。

综合而言，回应理论虽不依附于任何单一理论体系，却在对话主义及伦理批评等多重路径的交汇点上实现了整合。它既是文本分析的工具，又是价值判断的尺度。既能描述人物之间的互动机制，又可揭示文学作品在语言、伦理与叙事层面所承载的复杂能量。正因如此，回应不仅具有概念创新的理论潜能，也具备现实感知的分析效力。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回应的视角重新勾勒人物与社会、个体与他者之间的张力结构，从而为理解当代文学中的伦理困境与情感裂变提供新的切入方式。

整体来看，以往中韩学界关于余华小说的研究共同点主要聚焦于三个维度。一是苦难叙事的表达与伦理意涵，⁴⁾二是叙事结构及时间空间策略的建构，⁵⁾三是哲学意蕴与人物间伦理关系的探讨。⁶⁾此外，中韩学界也对余华作品中的生存伦理、历史叙述与跨文化接受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形成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研究图谱。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其作品的思想内涵与美学特点。然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个体苦难的表现、叙事策略的建构与哲学意涵的阐释，虽有助于揭示余华小说的思想张力，却普遍忽略了人物间互动结构及其内在回应机制的整体性分析。特别是在将回应视为叙事动力与伦理行为的复合维度上，学界尚未建立起系统的分析范式。本文所提出的回应，正是在这一研究空白中尝试建构的一种补充性视角，不仅意在深化对叙

4) 贺靖婷, 《“生命不该承受之重”—〈活着〉悲剧性新探》, 中南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2010。

김봉연, 《余華 소설의 폭력에 관한 연구—중단편소설을 중심으로》, 송실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2011。

5) 田红, 《余华小说的时间形式》, 《太原教育学院学报》第23卷 第4期, 2005。

심혜영, 《위화의 『형제』와 ‘두 공간’의 공존》, 《중국현대문학》第45号, 2008。

6) 林喜敬, 《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看余华的生存哲学》, 青岛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2009。

신민준, 《희망의 길에서 발견한 타자—위화(余華) 작품 속 타자성 분석》, 고려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2025。

事伦理的理解，也力图重新勾勒文学人物在特定社会语境中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反应。

为了进一步探讨余华小说中回应机制的演化路径，本文以《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兄弟》三部具有阶段性特征的作品为分析对象。这三部小说不仅覆盖了余华创作从先锋走向现实的转向轨迹，其人物回应方式也呈现出由‘缺席’到‘觉醒’再至‘跃迁’的递进变化，体现出结构上清晰的演变逻辑。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跃迁’被界定为回应机制在性质、方向或功能上的显著转变，既可能体现为伦理关怀的深化与结构的优化，也可能表现为价值取向的偏移与功能的异化。异化因此被视为跃迁的一种特殊形态，其特征是在工具化、消费化或权力逻辑的驱动下，回应逐渐背离了最初的伦理指向，甚至呈现出反向的社会效果。这样的界定既保持了‘跃迁’作为总括性范畴的开放性，又为后续文本分析中区分正向与负向的跃迁提供了明确依据。回应的缺席、觉醒与跃迁，实际上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学对‘如何与他者相处，如何在语言失效中维系情感’的深层回应。余华以克制而冷峻的方式，描绘了现代性背景下人际联结机制的失衡，也以文学的形式重新发明回应的可能性。

回应缺席时，暴露的是制度性冷漠与个体间信任断裂。回应觉醒时，体现的是苦难中微光不灭的坚韧承受。回应跃迁时，则在荒诞与失序中重构意义与情感的连接点。通过对回应的剖析，本文关注的不仅是人物行为表层的语言或动作，更试图揭示在社会转型的深层结构中，那些看似微弱却极具象征意味的情感坚持、人性光辉与关系重建的努力。这不仅属于文学书写的范畴，也回应了现实世界中人际断裂与精神失序下对真实联结与价值回归的深层渴望。

II. 回应的缺席：沉默结构与《在细雨中呼喊》的断裂叙事

《在细雨中呼喊》是余华创作初期的重要作品，也是其先锋写作时期的

代表之作。在回应机制的分析框架中，该作品的核心特征集中体现在‘回应的缺席’的状态：人物虽面临来自具体他者的呼唤，却无法完成对话链条。小说以‘我’童年时期的回忆为主线，围绕家庭暴力、父亲的死亡、兄弟的疯癫等事件展开，构建出一个充满压抑、残酷与伤害的世界。这一时期的余华，尚未转向叙述活着的意义，而是在不断试图击碎现实、破坏秩序，以表现个体存在的荒诞与碎裂。本章将以‘回应的缺席’为关键词，结合回应对象类型与表现层面分析小说中的沉默结构和人物沟通断裂，揭示其所呈现的伦理失衡和情感真空，进而说明余华在早期叙事中所建构的是一种无法建立互动的绝望现实。小说开篇即从黑夜的恐惧写起。

一九六五年的时候，一个孩子开始了对黑夜不可名状的恐惧。我回想起了那个细雨飘扬的夜晚，当时我已经睡了，我是那么的小巧，就像玩具似的被放在床上。屋檐滴水所显示的，是寂静的存在，我的逐渐入睡，是对雨中水滴的逐渐遗忘。应该是在这时候，在我安全而又平静地进入睡眠时，仿佛呈现出一条幽静的道路，树木和草丛依次闪开。一个女人哭泣般的呼喊声从远处传来，嘶哑的声音在当初寂静无比的黑夜里突然响起，使我此刻回想中的童年的我颤抖不已。⁷⁾

这一呼喊属于具体他者的呼喊，但它既没有明确指向，也缺乏回应者的出现，只是以“传来”的方式漂浮在空间中，形成了无主语、无反馈的声响孤岛。无回应的声音在此得以具象化——触发源存在，但回应链条彻底断裂。‘我’的反应是颤抖不已，这不是对意义的理解或共情，而是直抵生理的恐惧反射，显示出语言层面的“缺席型回应”。这种感知到他者存在却无法建立交流机制的状态，正是《在细雨中呼喊》沉默结构的开端。

叙述者以回忆的方式描述童年对黑夜“不可名状的恐惧”。这段看似宁静的描写，却在结构上充满了压抑与断裂。细雨、水滴、幽静道路，本应是自然、温柔甚至带有童年安抚意味的意象，但在文本中却异化为孤绝、冷寂与

7) 余华，《在细雨中呼喊》，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2页。

死亡的象征。尤其“屋檐滴水所显示的，是寂静的存在”一句，将水滴从动态的时间流转转化为静止的空间标记，预示着叙事将进入一种失去交流能力的存在状态。

紧接着的“一个女人哭泣般的呼喊声从远处传来”，则成为打破表层平静的转折点。但这声呼喊既没有明确指向，也没有回应对象，只是以“传来”的方式漂浮在空间中，形成一种无主语、无反馈的声响孤岛。这种声音的非指向性本身便构成了回应的断裂：它不是沟通的尝试，而是情感在绝望中滑出的碎裂信号。

而‘我’的反应，也印证了回应机制的失效。“我颤抖不已”，并非出于对声音的理解或共情，而是一种不加媒介、直抵生理的恐惧。这种反应既没有思考，也没有言语，说明‘我’尚处于一种尚未获得回应能力的原始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声音成为惊吓的源头，而非交流的契机。世界成为压迫的空间，而非可以被理解的对象。

从空间结构上看，这一段描写中，“幽静的道路”并未引导‘我’走向他者或归属，而是象征着通向空无的路径。童年的‘我’如同被水滴催眠，被呼喊击碎，却又无法在语言中自我定位。这种感知到他者存在，却无法建立回应机制的状态，正是《在细雨中呼喊》中沉默结构的开端。

这种以细雨、黑夜、哭喊等意象所构成的记忆碎片，体现出主人公在童年时期所经历的情感断裂与认知隔膜。在这里，叙述者虽然以第一人称回忆过去，却并未获得理解或化解的权力，而是陷入对那种“不可名状的恐惧”的重复召唤之中。回应的缺席，不仅是语言沟通的缺席，更是情感连接与伦理秩序的失效。

这种‘无法回应’的体验贯穿于小说的整个叙述过程。从父亲的暴力、母亲的隐退，到兄弟的失控乃至家庭的整体崩解，‘我’所处的童年世界几乎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伦理支点。父亲的形象尤其具有象征意义，他不仅是一个具体施暴者，更是一种威权、禁言与压迫的象征。在这样的家庭结构中，语言逐渐失效，沟通成为危险行为，童年的‘我’学会以沉默保存自己脆弱的意识边界。

父亲的粗暴不仅体现在行为层面，也渗透进叙述的语气与句式结构中。小说中对父亲施暴场面的描写往往是不加铺陈、迅速切入情节，以下是一段具有代表性的叙述。

我听到自己说了一句：“是哥哥打的。”父亲将粪勺一扔，跳上田埂急步走回家去。⁸⁾

这一场景的触发源是家庭内部具体他者的直接对峙，回应表现层面为语言。然而，这一语言并未引发澄清或共情，而是陷入了‘无回应’状态——对话链条被扭曲为单向的惩戒信号。叙述者的澄清尝试立即被父亲的暴力反应所取代，令语言的解释功能在瞬间失效。这一事实错置构成了典型的‘缺席型回应’，短促、冷静的叙述节奏凸显了这种缺席的不可逆性，使语言由沟通工具沦为‘暴力的启动开关’。

语言在此不再是沟通的工具，而成为引发暴力的信号装置。叙述者试图借助语言求得公正回应，却未能唤起理解与辨别，只换来了父亲机械性的反应。紧接着，‘我’回家所见并非哥哥接受惩罚，而是父亲早已准备好草绳，在树下等待对‘我’的惩戒。更为讽刺的是，叙述者随后揭示：由于弟弟的诬告，事实已被篡改成是我先用镰刀砍了弟弟，然后哥哥才使我满脸是血。⁹⁾一句意图澄清的陈述，最终在事实错置中失效，语言的解释力被彻底剥夺。最终，“父亲将我绑在树上，那一次殴打使我终身难忘。”¹⁰⁾小说并未描写具体暴力过程，仅以“终身难忘”一语作为对创伤的代指，这种省略反而使压迫更具象征性。

整个事件的叙述语言短促、冷静，几乎没有情绪波动，正体现了小说中回应机制的缺失与伦理逻辑的坍塌。在此结构中，语言的功能被压缩为‘暴力的启动开关’，原本应当承载解释与辨别的陈述，反而成为触发惩罚的信号。

8) 余华, 《在细雨中呼喊》,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3, 8页。

9) 余华, 《在细雨中呼喊》,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3, 9页。

10) 余华, 《在细雨中呼喊》,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3, 9页。

‘我’的言语被扭曲，诉求被抹除，最终只能在沉默中接受无法辩解的暴力。

这种语言上的压缩与沉默，并非出于叙事风格的审美选择，而是小说内部‘结构性沉默’的真实体现。在父权暴力主导的家庭结构中，语言不再具有沟通与救助的可能，而是蜕变为惩罚的引信。这种沉默不是选择，而是无法开口的存在状态，是在强制性的伦理系统中语言彻底失能的结果。小说以‘未及言说的压抑回响’展现了人物在极端压迫下被剥夺发声可能的伦理处境，也集中体现出回应机制全面断裂的结构性症候。

小说中孙光平的沉默，是在一场由父权羞辱所引发的伦理灾难后被动形成的。这种沉默并非孤立出现，而是对前文‘细雨夜恐惧’中语言缺席情境的延续与累积——从早先面对家庭内部暴力时的言语受阻，到此处在公共羞辱中的彻底失语，回应障碍在叙事中形成了递进链条。在这场事件中，孙光平的父亲孙广才得知儿子即将成婚，便自行前往未来亲家家中‘拜访’，却在对方面前出言粗俗、行为放肆。

我父亲坐在姑娘的家中，如同坐在寡妇的床上一样逍遥自在。他和对方父亲说话时脏字乱飞……姑娘的哥哥提着酒瓶出去，又打满了酒提回来。……楼上传来了沉闷的哭声，哭声仿佛是被布捂住了难以突围似的。我父亲却神态自然地在桌旁坐下来……说：“你女儿真结实啊……孙光平真他娘的有福气。”那时姑娘的哥哥快速地从楼梯上冲下来，一拳将孙广才连同椅子一起打翻了过去。那天下午，孙广才鼻青眼肿地回到村里，见到孙光平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亲事被我退掉啦。”

我父亲怒气冲冲地大声喊叫：“哪有这样不讲理的，我不就是替我儿子摸摸她身子骨结实不结实，就把我打成这样子。”从邻村传来的消息，则是另一种说法。我父亲孙广才送给未过门儿媳的第一件礼物，就是伸手去摸人家的乳房。¹¹⁾

在这段完整的描写中，读者可以清晰感受到事件的恶劣程度，父亲不仅出言不逊，更以粗鄙甚至带有性羞辱意味的语言侵犯对方家庭的伦理底线。

11) 余华，《在细雨中呼喊》，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49-51页。

这不仅毁掉了儿子的婚事，也让孙光平在村庄的公共视野中蒙受羞辱。小说并未直言父亲是否实施了具体的身体冒犯，而是以“沉闷的哭声”“惊恐万分地蹿出来”“打翻在地”等描写，构建出一种介于暗示与回避之间的伦理暧昧区，进一步加剧了文本中的回应障碍。

面对这一事件，孙光平的反应也显得克制与复杂。小说写道：“他最为激烈的表示就是连续几天没和村里任何人讲话。”¹²⁾沉默，在这里不是冷漠，而是语言系统彻底崩塌之后的无力对抗。他没有选择质问父亲，也没有公开反抗，而是以不说话作为唯一的回应方式，将羞辱、愤怒与悲伤压入内心。这种沉默并非回应的终止，而是一种语言不能负载情绪时的退场机制，是回应伦理灾难中的形态转化。

这种语言崩塌型的回应并非冷漠，而是当语言无法负载情绪时的退场机制。更具象征意义的是后文中‘空洞的信’，小说写道，“那时我经常收到哥哥的来信，但在信上什么都没说，信上空洞的内容让我感受到了哥哥空洞的内心。”¹³⁾这种空壳化的回应，成为沉默结构的象征标本，回应尚未终止，却已丧失实质。然而，《在细雨中呼喊》中的沉默并未止步于克制，更在小说后段被推进至极限状态。在父亲对孙光平妻子英花施以暴力侵犯之后，孙光平终于爆发，以割掉父亲左耳的方式进行回应，并因此入狱两年。这一行为不是简单的复仇或反抗，而是沉默崩溃后的极限表达。

在这场事件中，回应机制由缺席走向错乱，语言已无法承担任何申诉之责，暴力成为唯一仍具效能的手段。割耳不是伦理胜利，也非情感复仇，而是一种‘沉默的演进’。当话语彻底失效，身体只能以破裂来替代发声。这不仅深刻揭示了父子之间不可修复的裂痕，也呈现出父权结构下回应机制的断裂轨迹：从压抑、羞辱、失语，到沉默、崩塌、失控，这正与绪论中‘回应缺席’的逻辑链条吻合。它揭示了父权结构下，伦理灾难如何一步步蚕食沟通可能，直至回应沦为爆裂或空无。‘我’的退缩、归乡的失语与代际的断裂，均是

12) 余华，《在细雨中呼喊》，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51页。

13) 余华，《在细雨中呼喊》，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51页。

这一机制的延伸与变奏，印证了回应缺席作为存在困境的普遍性。

作为本章的情节高潮，这一段落将《在细雨中呼喊》的沉默主题推向了伦理与情感的临界点，并在叙事结构上与第一章绪论中‘回应的缺席’的理论定义形成直接呼应。回应的不可达性，既是叙事节奏的中断点，更是人物生存困境的象征性写照。

而‘我’的回应则更为退缩，面对家庭暴力、母亲的哭泣与哥哥的沉默，‘我’始终未能作出正面反应。这种沉默既不是道德判断的结果，也并非冷漠的逃避，而是一种身处伦理断裂场域中不得不采取的生存策略。即便是在成年后的回忆中，‘我’的叙述也未呈现出明确的正义回击，而是在反复回望中延宕与模糊，使得回应的缺席不只是情节设定，更是一种深层的存在状态。此处的退缩，与前文细雨夜恐惧场景中语言的缺席、孙光平事件中的沉默反应，共同构成了递进式的回应障碍链条。

小说的结尾部分，通过一段极具象征意义的‘归乡叙事’，将回应缺席的主题推向了极致。叙述者在深秋傍晚回到阔别五年的南门，起初便遭遇语言与身份的异化——“我只能用外乡的口音向人打听南门在什么地方”¹⁴⁾，被楼上的孩子以“小孩，小孩”相称，已经从记忆与现实的双重层面被家乡拒斥。这种失语感，正是整部小说无法回应状态的延伸，也是绪论中所界定的‘回应的缺席’在空间与身份层面的延展。

更富象征意味的是他与祖父的相遇。两人曾是最亲密的家庭成员，却因“我们是都忘记了对方的模样以后，在路上相遇”¹⁵⁾。祖父“在那条他应该是最熟悉的路上迷路了”¹⁶⁾，象征着代际间传承的中断，而‘我’在反复确认方向、反复迷路的过程中，则表现出一种始终无法归位的存在感。这不是‘走错路’的简单失误，而是‘无路可走’的隐喻性景观，与此前事件中回应障碍的累积形成了呼应。

“我看到翻滚的乌云和通红的晚霞正逐渐融为一体……我站在落日的余晖

14) 余华，《在细雨中呼喊》，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275页。

15) 余华，《在细雨中呼喊》，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275页。

16) 余华，《在细雨中呼喊》，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275页。

之中，对着太阳喊叫：“快沉下去，快沉下去。”¹⁷⁾天色黑下来，雨点落下，一片突如其来的火光升起：“越来越大的雨点与那片火纠缠起来，燃烧的火不仅没有熄灭，反而逐渐增大。”¹⁸⁾暴力与毁灭在自然景观中凝聚成末日式图景，象征家庭秩序的全面崩溃。

借着火光，“我看到了那座通往南门的木桥”¹⁹⁾，终于抵达家门，却看到“我的两个兄弟裹着床单惊恐不安地站在那里……那个跪在地上号啕大哭的女人就是我的母亲。”²⁰⁾而“一个赤裸着上身的男人……凄凉地笑了起来，说道：‘你们都看到大火了吧。壮观是真壮观，只是代价太大了。’”²¹⁾

这一句看似调侃的语言，却深藏着伦理错位后的自我卸责与感知迟钝。他不再是家庭悲剧的参与者或反思者，而是以一种冷漠旁观的口吻，将毁灭性后果包装为‘壮观’的景观体验。这种语调的错位，正揭示了回应机制在伦理崩溃之后的彻底失效——回应已无法建立秩序，只能以空洞的陈述来替代责任。

‘我’最终的发言——“我要找孙广才”²²⁾，既是对父亲的直指，又是对身份的确认。然而在此刻，这句话早已丧失了寻亲的功能，而更像是一种被延迟至极限的呼喊，是‘回应’迟迟无法实现之后的最后挣扎。家庭结构已经崩塌，伦理纽带已成灰烬，回应的逻辑也随大火而散。

因此，小说以这一归乡场景作为终点，将‘回应缺席’的主题彻底内化为人物的生存困境。余华不是在控诉某个个体的沉默，而是揭示一种被制度性暴力与伦理塌陷共同逼迫出的集体失声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回应成为一场永远到达不了彼岸的努力，言语则成为飘散在火光与雨声中的残骸。

17) 余华, 《在细雨中呼喊》,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3, 275页。

18) 余华, 《在细雨中呼喊》,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3, 276页。

19) 余华, 《在细雨中呼喊》,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3, 276页。

20) 余华, 《在细雨中呼喊》,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3, 277页。

21) 余华, 《在细雨中呼喊》,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3, 276页。

22) 余华, 《在细雨中呼喊》,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3, 276页。

III. 回应的觉醒：苦难承受与《活着》的内在坚持

如果说《在细雨中呼喊》在沉默与断裂之中构筑了一个‘回应真空’，那么《活着》则在近乎极限的苦难循环里，让回应重新萌生，并逐渐内化为生命自身的一部分。这种变化，不是源于外部环境的改善，而是在一次次失去与孤立中，人物主动将回应转向与自我、与记忆、与存在的持续连接。

《活着》中的回应更多指向‘自我内部的伦理要求与记忆召唤’。它不依赖他者的即时回应，而是在语言系统趋于失效、关系网络崩塌之时，通过低声叹息、默默承受、顽强生活等方式，将回应的意义从外在互动转化为内在坚持。这种由缺席走向觉醒的转变，让回应不再依附于外部世界的回声，而是在人物的日常与记忆中找到延续的力量。

小说的回忆框架由老年福贵在田埂上与‘我’的相遇开启：

我遇到那位名叫福贵的老人时，是夏天刚刚来到的季节……我看到近旁田里一个老人正在开导一头老牛。犁田的老牛或许已经深感疲倦，它低头伫立在那里……老人嗓音响亮地对牛说道：“哪头牛不耕田？……走呀，走呀。”……随后，他唱起了旧日的歌谣……“皇帝招我做女婿，路远迢迢我不去。”

因为路途遥远，不愿去做皇帝的女婿。老人的自鸣得意让我失声而笑。可能是牛放慢了脚步，老人又吆喝起来：“二喜、有庆不要偷懒，家珍、凤霞耕得好，苦根也行啊。”……一头牛竟会有这么多名字？……老人悄声对我说：“我怕它知道只有自己在耕田，就多叫出几个名字去骗它，它听到还有别的牛也在耕田，就不会不高兴，耕田也就起劲啦。”²³⁾

福贵与老牛在田间的相处，是《活着》中最富象征意味的场景之一。故事发生在福贵老年，他独自与一头疲惫的老牛耕田。这一情境的回应来源，来自具体他者的存在与陪伴。福贵通过呼唤老牛、为它赋予多个名字，进行的是语言层面的安抚，同时在心理层面延伸出对逝去亲人的追忆。表面上，

23) 余华，《活着》，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4-6页。

他是在劝慰一头牲畜继续劳作，实际上，这些名字暗暗呼应了家珍、凤霞等已逝亲人的记忆，将他们重新带入现实的田间世界。这样的行为，其伦理指向在于维系与逝者的精神纽结，使孤独不至于彻底切断人与世界的联系。回应的状态在这里呈现为一种内化——即便无法获得回声，主体依然选择持续发声，在日常劳作中延续对他者的情感呼应。

在日常劳作的描写中，这种内在化的回应得到了延续。福贵在田间耕地时，会逐一‘点名’那些已逝的亲人：

今天有庆、二喜耕了一亩，家珍、凤霞耕了也有七八分田，苦根还小都耕了半亩。你嘛，耕了多少我就不说了，说出来你会觉得我是要羞你。话还得说回来，你年纪大了，能耕这么些田也是尽心尽力了。²⁴⁾

在日常劳作中，福贵不断为老牛重复呼喊那些熟悉的名字，这一场景同样属于具体他者的情感牵系。其表现层面跨越语言与心理：一方面是对牲畜的直接呼喊，另一方面是将内心的记忆和情感借由声音投射出去。伦理上，这种重复并非幻想逃避，而是一种清醒的精神实践——明知亲人已不在，仍以命名的方式维系他们在生活中的位置。这样的回应，已不依赖他人的在场或言语交换，而是进入一种持续、稳定的自我实践状态，从而在孤独的生存环境中支撑起主体的伦理完整性。

小说在时间与事件的编排上呈现出近乎均匀的叙事节奏。福贵的人生被父亲重病、家产败光、战场拉伕、儿子有庆被抽血致死、女儿凤霞难产而亡、妻子家珍积劳成疾等一连串苦难事件贯穿，直至老年与老牛相伴为终。叙述者并未渲染情绪，也没有制造突兀的戏剧性转折，而是以平稳语气将这些创伤纳入日常化的生存轨道。

在这样的叙事节律中，回应逐渐脱离即时对话的逻辑，转向一种隐匿的自我修复过程——福贵对每一次创伤的承受，都通过沉默、顺应与继续生活的方式完成情感的消化。按照绪论的‘回应’分类，这种形态不依赖外部反馈，而

24) 余华，《活着》，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183页。

是主体面对失序现实时的一种内向回应：它既没有明确的表态，也没有可见的姿态，却在持续的承受中维系着人与生命之间最低限度的联结。

这样的描写，实质上在为回应的觉醒铺路。苦难链条不仅是情节推进的手段，也是促使主体不断调整回应方式的过程——从等待外部回应，到不再依赖外部，再到在内心重建秩序。正是在一次次创伤后的沉默选择中，回应由表层的互动形式，转化为深层的生存姿态。

在家庭关系层面，《活着》展现出一种柔性而持久的回应方式。家珍在贫病交加的岁月里始终陪伴福贵，这一回应来源同样属于第一类具体他者，她以沉默与微笑维系家庭的最低温度，表现层面为克制的语言回应。凤霞虽然失语，却以持续的劳动参与家庭运转，这是行动层面的回应，力量在于默默守护家庭的秩序。二喜在凤霞去世后背着她的遗体回家，这一举动兼具行动与心理的双重层面，它安置了亲情的归宿，也在无言中延续了她的家庭位置。它们的伦理指向在于守护亲情链条，使家庭在一次次失落中依旧保持温暖与联系。回应的状态上，这些情感与行动构成了从缺席到觉醒的延续性，不依赖即时对答，而是在漫长共处与苦难承受中，通过日复一日的行为和情感默契维系关系与伦理秩序。与福贵对老牛、对亲人的呼唤相互呼应，这种回应像隐秘的河流，在生活深处缓缓流淌，为疲惫的生命保留温度与完整。

《活着》的叙事在时间与事件节奏的安排上，呈现出一种平稳而连贯的推进：父亲重病、家产败光、战场拉伕、儿子有庆被抽血致死、女儿凤霞难产而亡、妻子家珍积劳成疾，直至老年与老牛相伴为终。这一系列事件的回应来源主要是来自第三类——历史与时代事件所带来的集体经验，以及第一类具体他者的关系维系。在表现层面上，福贵对每一次创伤的回应几乎不依赖情绪性的语言或激烈的行为，而是通过心理层面的承受与顺应完成自我修复。其伦理指向，是在无法改变外部现实的前提下，维系残存的生活秩序与尊严。这种回应状态表现为内化的延续——它并非抗争，而是在极限生存中调低期待、重建日常，使生命在苦难循环中保有最低限度的稳定与完整。

在小说末尾有这样一段描述，

我知道黄昏正在转瞬即逝，黑夜从天而降了。我看到广阔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着她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来临。²⁵⁾

这一场景的回应来源于自我内部的伦理要求与记忆召唤，因为这里的“土地”已成为福贵内心的精神寄托和存在确认。表现层面跨越心理与象征性的语言描写：黄昏、夜色、大地的形象构成了一种无声的允诺。伦理上，它象征着生存的延续与苦难的收容，使回应的意义超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进入人与存在、人与命运之间更深沉的呼应关系。回应状态在这里呈现为完全的内化与升华——它已不再依赖外部的回应者，而是主体在孤独中与存在达成的隐秘共在。

与《活着》中温柔而延续的沉默相比，《在细雨中呼喊》的回应缺席呈现出另一种面貌。其回应的来源主要落在具体他者的呼唤与对峙，但在表现层面却频繁沦为沉默或暴力中断，导致伦理指向被彻底阻断。沉默在这里不是慰藉，而是切断个体与世界连接的障壁；语言的断裂与记忆的空白，使主人公始终处于无法触及他者的孤绝状态。回应的状态因此表现为持续的缺席，并逐渐成为心理创伤的核心来源。

相比之下，《活着》虽然同样以沉默为主要表征，但其回应来源更加多元：既有第一类具体他者(家人、老牛)的关系维系，也有历史与时代事件带来的集体经验，更有源自自我内部的伦理召唤。在表现层面上，语言、行动与心理彼此交织——福贵对逝者的呼唤、对土地的抚触、对老牛的命名，都是在无声中维系情感与秩序的方式。伦理上，这种回应已由对他者的期待转向主体对自身存在的持续认领与承担，呈现出内化与升华的状态。

这种从回应真空到回应内化的变化，不依赖宏大叙事或情绪宣泄，而是在平凡生活的重复劳作与日常照料中，逐渐积累出一种含蓄而坚韧的回应结构。它既是对苦难的接纳，也是对生命价值的确认。当福贵为老牛赋予自己的名字“福贵”时，这一看似随意的命名，其实标示着回应从潜意识向伦理自

25) 余华，《活着》，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184页。

觉的跃迁——不为获得回应，只为在关怀的投射中重申生命的意义。

IV. 回应的跃迁：时代扭曲与《兄弟》的伦理崩坏

《兄弟》作为余华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的重要转型之作，以跨越文革后期至市场经济狂潮的宏大时间跨度，呈现出回应机制在时代变迁中的剧烈跃迁。小说以李光头与宋钢这对异姓兄弟的命运为主线，穿越精神狂热与物质膨胀的两个时代，构建了一个由温情、扭曲直至荒诞的多重回应谱系。在这一谱系中，回应的对象既有来自‘具体他者’的直接呼唤与照拂，也有‘制度与权力’施加的压迫与规训，更有‘历史与时代事件’带来的集体记忆冲击，以及‘自我内部的伦理召唤’。不同来源的回应，在语言、行动与心理等表现层面上交错显现，彼此之间既有延续，也有断裂。

第一部的文革时期，回应多以具体他者之间的情感维系为核心，带有尚未被彻底异化的温情基调；第二部进入市场化时代后，回应的伦理基础不断动摇，出现了被功利与欲望侵蚀的扭曲形态；而在结尾部分，回应又以荒诞化、象征化的方式完成了一次突兀的跃迁，形成了独特的悖论式救赎。由此，《兄弟》不仅展现了回应在个体生命史与社会变迁交织中的多重面貌，也揭示了现代中国伦理现实的复杂景观——回应既可能是维系关系与尊严的柔性力量，也可能被异化为控制与操纵的工具，更可能在伦理崩坏之后，以象征化的姿态重新获得文学意义上的生机。

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²⁶⁾

26) 余华，《兄弟》，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669页。

第一部所描绘的文革时期，尽管制度与权力的高压渗透至生活的每一角落，但人物之间仍保留着以‘具体他者’为触发源的温情回应。在那个精神狂热与道德秩序动荡并存的年代，回应常常不依赖语言，而是通过直接的身体行动来完成。在李光头父亲跌入粪池的极端情境中，围观的人群选择袖手旁观，沉默在此并非中性的沉默，而是隔绝、冷漠与规避风险的合成结果。然而，宋凡平却在毫不犹豫间跳入粪池将其救出。小说中写到，“宋凡平毅然地跳了下去。这就是为什么李兰后来会深爱这个男人。”²⁷⁾这一举动跨越了羞耻与危险的界限，体现了在行动层面上尚未泯灭的伦理冲动。

这一回应既是对‘具体他者’的直接救助，也是对‘制度与权力’间接施加的冷漠氛围的逆反——在全场的静默与回避中，宋凡平的下场注定不会因这一行为而获得制度奖励，甚至会带来更多政治风险。然而，正是这种超越功利与安全计算的本能行动，使回应极端语境中保有一丝温度，也为全书的回应跃迁提供了初始基点。小说并未将回应局限于事件本身，而是让它在记忆与情感的延续中获得更深的意味。

李兰自从宋凡平死后，再也没有洗过头发。……她把自己的头发弄得又黑又亮，梳理得整整齐齐，然后昂首走上大街。刘镇的孩子跟在她身后，一声声地叫着：“地主婆，地主婆……”李兰的嘴角始终挂着骄傲的微笑。²⁸⁾

宋凡平的救人之举，使李兰在其去世后以不洗头的方式纪念亡夫。这种日常化、持久化的仪式，不属于语言的争辩，也不是制度性认可的‘英雄叙事’，而是心理层面与行动层面交织的持续回应。它既是对过往情感的执守，也是对羞辱与遗忘的静默抗辩，展现了回应极权时代依然可能存续的柔性伦理力量。

在宋凡平去世后的少年时期，宋钢与李光头之间的关系，更多体现为一种来自‘具体他者’的日常照应。这种回应不依赖明确的伦理话语，也不由制度

27) 余华，《兄弟》，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27页。

28) 余华，《兄弟》，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188-189页。

与权力强制赋形，而是在共同生活的细节中自然生成。小说描写他们一起分享奶糖与米饭的场景：

两个孩子把奶糖放在嘴里慢慢地舔，慢慢地咬，慢慢地吞着口水……李光头把米饭放进了嘴里和奶糖一起嚼，宋钢也学着把米饭放进了嘴里……宋钢一边美美地吃着，一边亲热地叫着：“李光头，李光头……”李光头也是一边吃着一边叫着：“宋钢，宋钢……”²⁹⁾

在这里，回应的触发源并非外部压力，而是生活共同体内部的亲密互动。其表征层面既有语言的互换，也有同步动作的模仿，这种双重回响强化了彼此的情感黏性。它既不是功利驱动的交流行为，也不带有象征化的仪式，而是一种源自依恋本能的原初回应形态。

这种原初回应为后续的伦理变化提供了心理基底。正因为童年经验中曾存在过直接而纯粹的情感回应，小说在进入市场化时代后，那些被资本逻辑与欲望结构扭曲的回应才显得格外刺眼。也就是说，童年的无功利回应与成年后的功利化回应之间，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叙事对比线索——这正是全书回应跃迁能够被凸显的重要叙事前提。

进入市场化时代后，宋钢的回应对象逐渐从‘具体他者’(兄长、家庭)转向‘自我内部的伦理要求’——这种转向不是主动选择，而是被身体残疾、情感受挫与社会疏离一步步逼迫出来的。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旧遵循着一种微弱却执着的回应逻辑。

他重新戴上口罩……他怕自己的肺病会传染给收尸的人。……驶来的火车让他身下的铁轨抖动起来，他的身体也抖动了，他又想念天空里的色彩了，他抬头看了一眼远方的天空，他觉得真美；他又扭头看了一眼前面红玫瑰似的稻田，他又一次觉得真美，这时候他突然惊喜地看见了一只海鸟，海鸟正在鸣叫，扇动着翅膀从远处飞来。火车响声隆隆地从他腰部碾过去了，他临终的眼睛里留下的最后景象，就是一只孤零零的海鸟飞翔在万花齐放里。³⁰⁾

29) 余华，《兄弟》，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53-54页。

小说写他在卧轨前，细致地整理眼镜、衣物与口罩，这一系列动作构成了典型的‘行动层面’回应：他害怕自己的肺病“会传染给收尸的人”，于是选择在死亡之前，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他人的潜在伤害。这不是言语的表白，而是一种将伦理关照内化为身体仪式的默默执行。

紧接着，文本将视线引向‘心理层面’回应——在生命终点，他抬头望见“红玫瑰似的稻田”“飞翔的海鸟”。这种景象并不改变死亡的结局，却在审美感知中完成了最后的世界回望。这一瞬间，回应从伦理义务延伸为审美觉醒，在彻底的孤绝中释放出主体与世界的温柔连接。

从回应状态来看，这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觉醒，也非纯粹的缺席，而是一种在崩塌边缘维系最后秩序的‘极限回应’：它超越了语言，也超越了功利性的行为解释，在荒诞的终局中留下了微弱却持续的伦理余温。这种余温为全书的回应跃迁构建了最高点，也为后续与李光头的彻底异化形成尖锐对照。

与宋钢的临终回应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李光头的回应对象从早期的‘家庭与兄长’彻底转向‘欲望与权力结构’，这种对象来源的改变，使他的回应表征完全滑向异化形态。

李光头优雅地回答，举着酒杯等着林红的酒杯伸过来碰了一下，林红小小地喝了一口，放下了杯子。李光头像跟人拼酒量一样一口喝干了杯中的红酒，把酒杯放下后，李光头狗改不了吃屎了，对着林红粗鲁地喊叫一声：“快吃，吃完了快洗，洗完了到床上等我。”

同样的时候，宋钢坐在周不游点心店里，平生第一次吃着吸管小包子。灼热的肉汁烫伤了宋钢的口腔，宋钢全然不觉，当他站起来走出点心店，向着城西的铁路走去时，李光头已经狼吞虎咽地吃完了晚餐，焦急万分地催促着林红快吃。这就是人世间，有一个人走向死亡，可是无限眷恋晚霞映照下的生活；另两个人寻欢作乐，可是不知道落日的余晖有多么美丽。³¹⁾

在他与林红的互动中，语言层面已失去沟通与情感传递的功能，沦为控

30) 余华，《兄弟》，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630页。

31) 余华，《兄弟》，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632页。

制与羞辱的工具——“快吃，吃完了快洗，洗完了到床上等我”这样粗鄙的指令，不仅剥夺了对方的主体性，也将亲密关系异化为赤裸的支配关系。

在行动层面，李光头的‘回应’更多体现为物质收买与制度化操控，例如对企业员工以金钱、职位进行交换式笼络。这种回应并非缺席，而是被彻底重塑为工具理性主导的交易模式，其伦理指向已经从关怀转向了操纵，从相互依存转向了单向度的支配。

小说在叙事结构上巧妙地将这一异化回应，与宋钢卧轨前的非语言回应在同一时间线中对位展开：同一刻，宋钢在火车声中凝视稻田与海鸟，以审美感知完成最后的温柔告别；李光头却沉溺于晚餐、酒精与占有欲之中，全然与兄长的死亡失联。这一对位结构，将二人的伦理轨迹推至两极化的分野：一个在死亡中保有回应的余温，另一个在生存中完成回应的空洞化。

然而，小说在结尾制造了一次意外的‘象征性回旋’：李光头将宋钢的骨灰送入太空。

李光头的眼睛透过落地窗玻璃，看着亮晶晶深远的夜空，满脸浪漫的情怀，他说要把宋钢的骨灰盒放在太空的轨道上，放在每天可以看见十六次日出和十六次日落的太空轨道上，宋钢就会永远遨游在月亮和星星之间了。

“从此以后，”李光头突然用俄语说了，“我的兄弟宋钢就是外星人啦！”³²⁾

这一行为的对象来源依旧指向兄长，但表征层面已由现实行动跃迁为高度象征化的‘诗性动作’。伦理上，这并非责任的回归，而是一种荒诞化的情感缝合——将兄长置于“每天可以看见十六次日出和十六次日落的太空轨道”，使其“永远遨游在月亮和星星之间”。这种回应处于觉醒与异化之间的暧昧地带，既是荒谬的，又带有某种不可解释的情感真实。

从回应状态来看，这是一种‘象征跃迁’：它没有逆转伦理崩坏的现实结局，却在文学层面完成了回应意义的再造。李光头在权力与物欲的外壳下，被短暂地重新定位为回应者，这种瞬间的诗性回旋为全书的回应轨迹留下了

32) 余华，《兄弟》，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668页。

最后的震荡余波。

综观《兄弟》中回应的演变轨迹，可以清晰看到它在不同对象来源、表征层面与伦理指向中的连续变形：第一部中，回应主要发生在‘家庭成员’与‘生活共同体’之间，以救援、情感坚守和生活互助等行动层面为主，表现出尚未被时代全面侵蚀的温情形态；进入第二部，回应对象日益被‘权力—欲望’结构所占据，表征方式逐渐异化，语言层面沦为控制与羞辱的工具，行动层面则滑向物质收买与操控。

在宋钢的身上，这一过程最终收束于‘死亡中的非语言回应’——他在生命的终点，以审美感知和细节关怀维系着对世界的最低限度的温柔。这种回应状态处于‘觉醒’与‘终结’的交汇点，成为伦理残响的最后注脚。而在李光头的路径上，回应状态从异化走向象征跃迁——太空送骨灰的荒诞行为，虽无法弥合现实的伦理裂痕，却在文学空间中制造出一次短暂的情感回旋，使读者在荒谬与感动之间产生摇摆。

与前三章相比，《兄弟》中的回应轨迹不仅呈现出对象来源的剧烈转移（由亲密共同体到权力欲望），也揭示了表征层面的复杂化与状态的多重并存：温情、异化、觉醒与象征跃迁交织在同一叙事结构中，形成强烈的伦理张力。这种结构安排，使回应不再是单一的道德选择，而成为时代语境、个体命运与关系模式相互牵制下的动态生成过程。

在全书的结构逻辑中，《兄弟》承担着“回应跃迁”的关键节点作用：它延续了《活着》中沉默与延续的内化特征，又为回应进入异化与象征化阶段提供了历史与社会的现实土壤。最终，回应在真实与荒诞、温情与冷漠的张力场中完成了最为复杂的形态转化——既记录了伦理秩序的瓦解，也在文学的象征维度上，为回应保留了最后的可能性与诗性余响。

V. 结论

本研究通过‘回应’机制的动态演变，梳理了余华小说在不同创作阶段中人物与世界之间的互动形态及其伦理指向。从《在细雨中呼喊》的‘回应缺席’，到《活着》的‘回应觉醒’，再到《兄弟》的‘回应跃迁’，这一轨迹既是叙事形态的变奏，也是伦理视野的拓展与重构。

在《在细雨中呼喊》中，回应的缺席并非单一的沉默，而是语言断裂、情感隔绝与伦理真空的交织。恐惧的细雨夜、父子间的误判、被撕毁的订婚信，构成了无法对话的链条，个体在孤绝中与世界失联。这一阶段，回应机制失去作用，沦为创伤的生成器。

进入《活着》，回应沉默中悄然回流。它不再依赖言语的双向确认，而是渗入重复劳作、躯体耗损与记忆呼唤之中。福贵对老牛的呼唤、抚摸土地的手势，都是对生命持续的无声承认。这种回应虽微弱，却能在苦难的荒原上支撑起主体的伦理自觉，实现从‘缺席’到‘觉醒’的过渡。

到了《兄弟》，回应机制进入最为复杂的跃迁阶段。一方面，早期童年与亲情场景中仍保留伦理残响与温情互动；另一方面，市场化与权力逻辑的渗透，使回应逐渐异化为操控、消费与符号化行为。在宋钢与李光头的命运分化中，回应的伦理与审美内涵被推向两个极端——宋钢以临终前的感官与审美体验完成对世界的最后温柔回应，而李光头的回应则彻底沦为欲望和资本逻辑的附庸。小说结尾处象征化的“骨灰送入太空”在伦理上悬而未决，却在文学维度上制造了诗性缝合的可能性，显示出余华在伦理崩解之后对回应再造的想象力。

综观三部作品，余华的‘回应’机制经历了从真空到觉醒、从觉醒到跃迁的连续变化，其伦理涵义由私人情感逐步扩展至社会伦理与人性探问。在回应不断被改写、异化甚至重构的过程中，那些残存的、细微而坚韧的回应——无论是一声呼唤、一次凝视，还是一个荒诞的仪式——都成为维系人性温度的最后凭依。它们提醒我们，文学中的‘回应’，不仅是叙事行为的呈现，更是对生

存意义、伦理承诺与情感归属的持久追问。正如细雨中被隔绝的呼喊、荒原上抚摸土地的双手、临终前追随海鸟的目光所示，这些瞬间虽短，却在叙事深处留下了长久回响。

<参考文献>

- 김봉연, 《余華 소설의 폭력 에 관한 연구—중단편소설을 중심으로》, 송실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2011.
- 신민준, 《희망의 길에서 발견한 타자-위화(余華) 작품 속 타자성 분석》, 고려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2025.
- 심혜영, 〈위화의 『형제』와 ‘두 공간’의 공존〉, 《중국현대문학》 第45号, 2008.
- 심혜영, 〈위화의 글쓰기와 문학의 진실〉, 《중국어문학지》 第19輯, 2005.
- 이선옥, 〈余華의 문학세계〉, 《中國文學》 第78輯, 2014.
- 巴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巴赫金全集》 第5卷, 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9.
- 贺靖婷, 《“生命不该承受之重”—〈活着〉悲剧性新探》, 中南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2010.
- 林喜敬, 《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看余华的生存哲学》, 青岛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2009.
- 孙向晨, 《面对他者:莱维纳斯哲学思想研究》,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8.
- 田红, 〈余华小说的时间形式〉, 《太原教育学院学报》 第23卷 第4期, 2005.
- 余华, 《在细雨中呼喊》,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3.
- 余华, 《活着》,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2.
- 余华, 《兄弟》,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2.

< Abstract >

This study centers on the concept of the “response mechanism” to examine the mode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characters and the world, as well as the trajectory of ethical transformation, in Yu Hua’s three representative novels: *Cries in the Drizzle*, *To Live*, and *Brothers*. By tracing the dynamic shift from “absence of response” to “awakening of response” and finally to “transformation of response,” the study reveals the generative logic and transformative patterns of the mechanism across different historical contexts and social structures. In *Cries in the Drizzle*, the absence of response manifests as a convergence of linguistic rupture, emotional isolation, and ethical vacuum. *To Live* internalizes response into silence, labor, and memory, marking the transition from void to awakening. *Brothers*, under the impact of marketization and power structures, retains traces of warmth on one hand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distorting response into manipulation and commodification, culminating in the absurd yet poetically suturing act of “sending ashes into space.” The study argues that the response mechanism in Yu Hua’s novels is not merely an act of interpersonal exchange but constitutes a profound system of ethical symbolism, whose evolution offers a literary reflection on the fracture of relationships, emotional alienation, and ethical reconstruc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Key Words : 余华(Yu Hua), 回应机制(Response Mechanism), 叙事伦理(Narrative Ethics), 伦理转型(Ethical Transformation), 当代中国文学(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